

复旦文史丛刊

形神之间

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

董少新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复旦文史丛刊

形神之间

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

董少新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董少新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
(复旦文史丛刊)
ISBN 978-7-5325-6647-1

I. ①形… II. ①董… III. ①现代医药学—医学史—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R-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6772号

复旦文史丛刊

形神之间

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

董少新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制版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2 插页 2 字数 444,000
版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6647-1/R·86
定价 88.00元

本项研究曾先后获得如下单位的资助：

东方葡萄牙学会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东方基金会 (Fundação Oriente)

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

特此鸣谢！

“复旦文史丛刊”编纂说明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后,致力于推动有关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研究,近期重心是围绕着“从周边看中国”、“批评的中国学研究”、“交错的文化史”和“域外有关中国的文字资料与图像资料”、“宗教史、思想史与艺术史的综合研究”等课题进行探讨,同时,也鼓励其他相关文史领域的各类研究。为此,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这套“复旦文史丛刊”,丛刊不求系统与数量,唯希望能够呈现当前文史研究领域中的新材料、新取向、新视野和新思路,并特别愿意鼓励和收录年轻学人的著作。

本丛书基本体例如下:

(一) 本丛刊收录有整体结构和完整内容的有关中国文史的研究专著,不收论文集。

(二) 本丛刊内所收专著,一般字数在25—40万字,个别情况可以超过此限。

(三) 接受国外以其他语言写成的专著的中文译本。

(四) 注释一律采用页下注,书后要有《引用文献目录》,如有《人名索引》和《书名索引》,则更为欢迎。

（五）本丛刊设立匿名审稿制度，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聘请两位国内外学者担任匿名审稿者，如两位审稿者意见和结论彼此相左，则另请第三位审稿者审查。

（六）本丛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

2008年5月

周振鹤序

对于晚明至清前期中外文化接触的研究近年来已渐渐深入,与半个多世纪前的情形相比大有改观。此前中外都只有少数人在从事这一研究,许多原始史料尚未被发现,或是已被发现,而未能得到正确的解读,或者已经解读,但尚未体会到其重要性及其在中国绵长历史上的作用。现在则除了从一般文化交流的意义来探讨这一时期中西文化接触过程外,还从天文学、地理学、数学乃至语言学等专门学科来详析这一过程对双方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虽然在中西医学接触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化,但不少论文已经接触到这方面的问题,而董少新这部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或许是目前该领域比较全面且比较深刻的著作。历史编纂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揭示我们尚未知晓的真象,填补前人未曾注意的空白。这部书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这一任务。

与上述所提到的天、地、数等学科不同,西洋医学入华引起的动静显然比较小,这是有其原因的。中国传统历法的不够精密在晚明已经表现得十分突出,所以在天算之学方面以西法来补中法之不足,显然是一个迫切的要求。在晚明已经有崇祯历书的编纂,到清初虽然有杨光先引起的迫害传教士的历狱,但西法的优胜终究压倒“宁可使中土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土有洋人”的谬论,所以天主教传教士在清中期以前实际上一一起

着钦天监正的作用。在地理学方面,利玛窦入华最引起一般中国士人震动的,就是他所绘制的几幅世界地图。这些地图使先进的中国人从只知道有天下——即由中国与四夷所组成的世界,跃进到对中国不过是世界万国之一的理解。这是晚明地理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1〕}而且有些人更进一步在思想上产生了“声教广被,是耶非耶”的怀疑,不再以为中国文化是独步于世界的最优越的文化。至于数学方面的几何学,更是中国数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学问。《几何原本》头六卷的翻译将中国人带进了一个新的数学世界里。无怪乎译者之一的徐光启,惊呼这是人人必须要学的学问。^{〔2〕}

至于医学则情况有所不同。中国医学源远流长,数千年来已经自成一个体系,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一直行之有效,以至于今日西洋医学仍不能完全取而代之,尽管近来又有中医不科学的呼声再起。因而虽然从晚明起,西洋医学已经随天主教传教士入华,但在学术领域远不如天、地、数诸学对中国文化影响之钜。也正因为如此,要充分揭示西洋医学入华以后的行医实践以及医学理论影响中国士人的程度也就不那么容易。另外的一层难度,则是专门学科的知识所引起的。梁启超曾说过专门史应该由专门家来写作,这自然是不错的。因为物理学史如果不由物理学家来写,那不但是水平要大打折扣,恐怕还会出现谬误。但由历史学家写专门史却也有个好处,那就是历史学家比较善于发现史料,善于阐幽抉隐,对于复原历史本来面貌比较有可靠的保证。董少新是学历史出身,于这一点有天然优势。其次是他为了研究医学史,下了功夫去读专门书。由此而懂得了不少医学知识。他在翻译一本伯驾的传记时,就表现了对医学知识与术语的熟练掌握。在写作本书时,更体现了这一点。在自己专业以外的领域中,为了不说一句外行话,就必须研读大量的内行书,这是专

〔1〕 参见拙文《中国地理学近代化的两个表征》,载《九州》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

〔2〕 参见拙文《翻译〈几何原本〉的文化史意义》,载《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纪念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门史作者成功的不二法门。第三是他有比较扎实的外文基础,除了熟练的英文以外,对葡萄牙文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大大有助于对晚明天主教传教士文献的解读。有此三点,他的这本书稿就自然而然地建立在可靠的学术基础上。

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在16世纪西方传教士到达中国以后,才被西方人士充分意识到。在此之前的马可·波罗游记多少还带有天方夜谭的性质,不少西方人是当成故事来读的。天主教传教士发回欧洲的信件与报告才使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知道在东方有一个与自身文明程度差不多但在哪一方面都不相像的文化存在。同样,天主教带来的形而下的器物,以及形而上的学术,也让中国知识分子大受冲击,意识到西方的天、地之学有补儒的作用,增长了中国士人的知识。而对于与天地参的人,中国的儒者也很希望能有西方新知的引进。这一点从毕拱辰为传教士邓玉函所译的《人身说概》的序里可以读出来。毕云:“甲戌岁(1634)余得交汤道未先生于京毂。一日乘间请之,谓贵邦人士,范围两仪,天下之能事毕矣;独人身一事,尚未睹其论著,不无缺望焉。”毕拱辰认为只有了解了西方关于人身的著作,才能全面了解西方文化,才能做到“仰观之,俯察之,近取之,三才庶几无缺漏之憾矣”。

尽管“近取之”的西洋人身之学在中国始终没有“仰观之”的天学与“俯察之”的地学影响大,但并非就不重要。早期入华的西洋人身之学在具体的行医活动、医学和药学知识传播方面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从本书以及董少新准备继续出版的另一本关于早期入华的西洋药理学专著可以明显看出。具体说来,本书上编即揭示传教士在华行医事迹,及其与传教之关系;下编则集中探讨早期西洋医学理论与观念的传入与影响。或者简而言之,上篇所探讨的大致是形而下的问题,下篇则讨论形而上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医生的地位并不高,与儒者不可相比。再著名的医生也只能入艺术传或方伎传,而不能入儒林传或文苑传。艺术的本意与今之技术同,艺术传所收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人物,医技不过是众技之一。这一

点与古代欧洲颇有相似之处,理发师亦可兼作医生,同样视医术为小技。也因此,除非医术特别高明,如扁鹊华佗之流,否则休想青史留名。因而于具体行医活动而言,无论是中国人本身,抑或是来华的西洋人,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并不丰富。非下大功夫,不能揭示其面貌。而从本书上篇的叙述,我们对晚明至清前期这一段比较隐晦的传教士行医史实有了相对清晰的了解。

下篇的难点则除了史料以外,还有对作者思辨能力的考验。董少新通过研究,深刻地认识到,“历来无论是传统中医还是传统西医,其理论都具有较强的哲学思辨色彩,与具体的诊断、治疗技术往往貌合神离。传统中医中的阴阳五行、气等理论如此,传统西医中的四元素、四液说也是如此。传统医学比现代医学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往往与宗教神学、伦理道德、思想观念等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此传统中西医学的交流史,也往往体现出宗教、思想和伦理等方面交流的内容”。所以下篇所论不仅仅局限于医学的层面,而更加注重随天主教神学思想传入的西洋医学给中国传统思想和观念带来的变化。

这种观念的变化自然首先发生于一些追求新知的中国士人身上,所以董少新很细致地分析了这些变化发生的过程。在医学领域里对异文化最容易接受的应该是在药学方面,因为只要能治好病,什么药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不管它是产于本土或异域。何况对症下药本来就是中医最重要的古训,在古代西方亦是如此。*arte medicinal* 一词是医学或医术的意思,但究其词源,似可直译为用药的技术。什么病以什么药来治,是最要紧的实践,病理学、生理学的发达则是近代科学昌明以后的事。所以接受西方的药物远比接受西方医学的其他内容要容易(上编写康熙皇帝对西药的兴趣已足以说明此点),而诸如解剖学一类的新知识传入中国,就必须要有个过程。中国人不容易接受解剖学,倒还不见得尽是拘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可能还因为中国的医者向来将人看作一个整体,一处发病就可能牵涉到全身,因此治病未必是就患处而治,那也许只是治标,以至头痛而可以医脚,因为那有可能是治本。这一点与西方可能

大异其趣。虽然西方将人看成机器是在 18 世纪以后才明确地以专门著作的形式出现,但这种思想却是早就有所本的。当然中国的医家与学者也并不完全拒绝了解人体的奥秘,本书以不小的篇幅来分析《人身说概》与《人身图说》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还专门辟有一章记述人体解剖图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不但在医学接触史上有意义,在更广泛的文化交涉史上也是很重要的。

对于近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我有浓厚的兴趣,十年前所写的《中日欧语言接触研究——以历史、封建、经济为说》就是这种兴趣的表现,尽管那只不过是一个粗浅的开端。近十数年来这一课题也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注意,但研究者多以晚清以来英语与汉语的接触为说,深入到晚明清初其他欧洲语言与汉语接触的较少。一则因为资料较少,二则受外语训练所限。新词语的产生代表新观念的出现,其意义不可小觑。有些新词语可能昙花一现,有些却能长期存留下来,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会在中外文化交涉史上留下印记。本书以第一部中外对照词典——罗明坚、利玛窦所编《葡汉词典》为据,将 16 世纪末收入此词典的医学词语逐一作了分析,不但可以使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西洋医学入华的一个侧面,同时也成为中外语言接触史一个很好的实例。但晚明至清前期入华的西洋医学词语自然超出《葡汉词典》的范围,希望有人能更深入地钻研,以让我们了解这个领域里尽可能多的内涵。

我于医学全然外行,不能对少新这部书的意义有深入的阐发。但最后有一点还值得一提。对于中医是否科学近来有相当热烈的讨论,但这一提法本身或许就存在问题。因为我们所定的科学标准就是西方的医学科学。这是一。其次,我们还往往以为正确的才是科学,而谬误就不算科学。在这种情况下,要判中医为不科学真是易如反掌。这里先不来对此事作一个评判,而只请读者注意一下本书提到西医学习与利用中医的一些地方是很有意思的。

总体说来,“尽管许多西洋传教士对中医很不以为然,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传教士对中医采取了认真研究的态度。他们通过中国医生的帮助,

了解了中医脉法、针灸、人痘接种术、性病治疗法以及许多中药知识,将其用于传教,并把这些知识介绍到了欧洲。鲁日满在江南传教期间,曾多次请中国医生为其治病,亦多次购买中药材;在禁教期间,也有西洋传教士利用中医传教的例子,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九月,在湖广总督特成额奏呈的‘湖北襄阳盘获西洋人物件清单’和‘起获私藏天主教经像清单’中,分别有‘小锡盒一个,内贮膏药’、‘残医书一本,系刊本,书名《一盘珠》;杂抄药方一小折’。《一盘珠》乃是康熙年间新淦人洪金鼎撰写的一部医药学歌诀,而其中‘杂抄药方一小折’的内容可能也是各类中药药方”。

而且中西医生合作至迟在康熙年间就见于记载。“康熙四十四年(1705)七月中旬,朝臣陈秉恒患‘搭背疮’,康熙帝派西洋大夫诊治,又命御医孙志定一同治疗。……八月下旬,清宫中的苏麻拉姑生命垂危,腹内绞痛,便血,不思饮食。罗德先及太医院大夫刘声芳、李颖滋等共同出诊,否决了康熙帝用西白噶瓜那的提议。罗德先认为,用西白噶瓜那,稍泻呕吐,虽治痢疾,但不可用于年老体弱者。”中医医生为传教士治病同样常见于文献,例如“康熙帝曾命御医前往诊治翟敬臣神父;康熙四十六年,清宫西洋医生宝忠义(鲍仲义)修士和张诚神父均患热病,御医李颖滋、张福贵曾前往治疗。马国贤神父有一次在热河骑马摔伤,康熙命一位满族医生给他治疗”。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只要能够治好病,即使西洋人士也是不会拒绝中国医学的。

但在我们注意到中医仍有其重要价值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即使在中国文化的这个最古老、受西方科学体系影响看来最少的领域,其话语也逐渐西洋化了。从理论到临床,中西医结合的结果似乎不是西医的中化,而是中医的西化。我曾在《中国文化的变与不变》中提及从物质的到制度的以至部分的精神文化都是可变的,只有最核心的精神文化与心态层面的文化才是不变的。中医的将来恐怕并非人为的废除,而是发生深刻的适应性的变化,而成为一种全新的中医。

人体的奥秘一点不亚于宇宙的奥秘。基因密码的破解直到最近才取

得重大进展,而中医的经络系统则至今未能有所解释。人身之学的确是与天地之学同样重要的学问。东西方对于这一学问的认识过程及其相互的交融,需要有许多专门著作来予以阐释。董少新这本书只是这些著作中的一部,希望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同时也希望他本人能尽快将中西药学接触的专著写成,以让我们看到早期入华医学产生影响的全貌。是为至盼。

目 录

周振鹤序 / 1

绪言 / 1

- 一 选题意义与研究角度 / 1
- 二 学术史回顾 / 6
- 三 治病之术与认知之途：初次相遇时的中西医学 / 19
- 四 葡萄牙海外扩张与西医东渐 / 24
- 五 耶稣会与医学 / 38
- 六 奥尔塔《印度香药谈》与东西方医学文化交流 / 48

上编 行医与传教

第一章 由教会到世俗：澳门西医事业的发展 / 64

- 一 澳门早期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概况 / 64
- 二 澳门仁慈堂与贫民医院 / 69
- 三 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医疗事业 / 78
- 四 方济各会士在粤澳地区的医疗活动 / 89
- 五 议事会参与社会医疗事务及军事医院的建立 / 99
- 六 澳门与西医入华 / 108

第二章 治疗身体还是拯救灵魂

——西洋传教士在中国民间的行医传教活动 / 124

- 一 行医传教之普遍性及其形式 / 126
- 二 严厉禁教与行医传教 / 137
- 三 奇迹治疗之阐释 / 141
- 四 善待恶疾患者 / 151
- 五 传教士与中国女性患者 / 173
- 六 传教士与弃婴及儿童患者 / 182

第三章 清宫中的西洋医学 / 193

- 一 康熙对医学的兴趣及南怀仁的响应 / 194
- 二 西医入京与清前期天主教政策之关系 / 199
- 三 宫廷行医与教派斗争 / 216
- 四 康熙皇帝学西医与西洋解剖学著作的翻译 / 234
- 五 宫廷西医与中医之关系 / 240
- 六 宫廷行医与传教之关系 / 246

下编 医学与性学

第四章 性学 / 255

- 一 入华西学的体系 / 255
- 二 理学的性学与神学的性学 / 262
- 三 医学与性学 / 276
- 四 传教士性学作品对王宏翰之影响 / 283
- 五 方以智对传教士性学知识的扬弃 / 296
- 六 中国士人对《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的评价 / 300

第五章 医学 / 313

- 一 天地人神之关系 / 315
- 二 人的生命历程 / 344
- 三 外官与内职 / 374
- 四 脏与腑：西洋解剖学与中医脏腑理论的相遇 / 393
- 五 脉、络、筋：西洋生理学与中医经络理论的相遇 / 399

第六章 译词的选择与创造 / 407

- 一 《葡汉辞典》中与医学有关之词汇 / 411
- 二 传教士性学作品中的医学词汇 / 419

第七章 西洋解剖图的传入、传播与演变 / 435

余论 / 461

参考文献 / 464

后记 / 493

绪 言

一 选题意义与研究角度

在史前时期,人类通过迁徙散居五洲,在一些环境适宜之地独立向文明迈进,进而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同时,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似乎一直存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一种文化的影响范围逐渐扩大,对外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逐渐缩短,相隔较为遥远的两个文明之间的交流从无到有,从偶尔到频繁,从通过中间环节到直接交往。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正如罗素所言:“一般总有这么一条规律,任何文明如果不同其他高于自己的文明保持交融,就必然导致自身的灭亡。人类历史上罕见有出现自发兴盛的时期和地区。”〔1〕

展卷世界地图,横亘北半球的亚欧大陆让人感觉庞大而古老。东亚文明、南亚文明、西亚文明和地中海文明镶嵌在这块大陆上,它们各具特色、自成系统,但是通过漠北草原、西域和南海交通,它们之间的交往从未停止。尽管这种交往过程险象环生,无数人丧生于途中,但正是这种交往,才最终造就了今日之世界。由于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端、太平洋西

〔1〕 罗素:《罗素文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217页。

岸,一部中外交流史,除了与东瀛的交往外,基本上就是一部中西交流的历史。这部历史在明朝中叶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此前的中西关系以中国与西域的关系为主,中外关系表现为中央帝国与四夷的关系;而此后则以中国与西洋的关系为主,中国开始迈开融入近代世界的步伐。此前中国与地中海文明的交往需要通过粟特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中间环节,^[1]此后中欧之间实现了直接的接触。交往的形式、内容以及东西方力量的对比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6世纪西人东来对中国的影响,通史家以“天崩地裂”来概括,意在说明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学知识和地理学知识对中国固有的天地观与天下观的颠覆性冲击,“传统的合理性依据被西洋传来的新知动摇,很多旧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就会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坍塌”。^[2]当然,这一过程并非真的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一蹴而就,而是从16世纪初开始,经历了500年的历程,在这五个世纪中,中华民族一直在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彷徨着、挣扎着、探索着、奋进着,渴望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就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而言,16至18世纪远不及19世纪和20世纪大。但是,明末清初是东西方文化的初次直接相遇,此前两者相对独立发展,均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形成了各自的体系,那么这两种在当今世界上仍居重要地位的文明,在其相遇之初,相互产生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相互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影响会是这样的?这些都是令研究者着迷的问题。这就像两个素昧平生、尔后又关系密切的人,他们的初次见面以及最初的相处时光总是值得回忆的。不仅如此,研究中西文明初次相遇的历史,将会为两者未来之交往与交融提供重要的参考,因为在相遇之时两者都是“原汁原味”的,发展水平不分高下,且交流过程不像清后期那样以武力强迫为主要手段(晚明所受到的武力威胁主要来自文化

[1] 明以前中西交往中中间环节发挥着重要作用,参见蔡鸿生:《仰望称寅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6—77页。

[2]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4页,并参考第328—379页。